

燃燒的 記憶

从维熙





2 039 1688 8

从维熙

燃烧的记忆

群众出版社

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燃 烧 的 记 忆

从 维 熙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0印张 496千字 插图6

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270 定价：2.10 元

印数：00001—60000册

序

张 志 民

说来也巧，我和维熙，是在“大墙”之下相识的。

几年之前，当历史宣布了那段暗夜的结束，人们从劫后的废墟上爬起来，要作的事情太多了。头一件，该干什么呢？谁也顾不得擦拭身上的血迹，抚摸自己的伤口，赶忙要办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寻找熟人的下落，打听战友们的消息。换句“拔高”一点的话，也可以说，想知道一下，自己队伍的伤亡。

有的同志，十年不知音信了；有的，已有二十年，或者比二十年还要更长些。在这漫长的岁月中，偶尔得知一些朋友的荒信，只言片语，多是道听途说的“马路新闻”，而且，各有各的“版本”，哪一件也难予考证。

对维熙，我过去并不熟悉。但因为是同行，从作品中，知道他是个颇有才华的青年作家。那时候，我自己也仅仅三十来岁，对一些蒙受委屈的青年文友，倍感同情。每有所触，常一个一个数着他们的名字，维熙，即是我念记中的一个。特别是当我听说，他的境遇，比别人更加严酷，夫妇两个，都被推进“大墙”之内，维熙的名字，就更是常常萦绕在我的心头。尽管还没见过面，但应该说，我已经认识了他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久别的朋友们，一个个重逢了。来自北京附近，来自遥远的边陲；过去没有机会见面的，今日已有幸相逢。那段时间，家里常常是满堂宾客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衣着简朴、身体结实、不大善于言谈的中年人，来到我家，这就是我想见到的维熙同志。

自然，用不着任何的介绍，我们就已经相熟了，我们开门见山地谈起一切。他给我的印象，恰好如同志们所说：维熙耿直、憨厚。他的文才，远胜于他的口才。

就是这次相见，我才知道，我们两家，原来是只隔一条马路的近邻。多年中，我们竟然互不知晓。不过，说起来，谁也没感到惊奇，因为“不给对方添麻烦”，已成为人们多年的习惯。如果不推倒那座人为的“大墙”，也许，直到今天，我们还难以相识。

从这个时候起，我们见面的机会多起来，我不仅认识了维熙，而且还认识了他爱人——和他同遭遇、共患难的张沪同志。在那间只有几米大的斗室里，还认识了他那位善良的、和他们相依为命的老母亲。也许是由于我们曾有一段相似的经历吧！我所听说的每一件事情，都如亲临其境，感到同样的辛酸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维熙拿来了他的小说稿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。

我怀着欣喜的心情，一口气读完了这篇作品。稿子放在了桌上，但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，是什么力量掀起我心头的涌浪呢？除去一篇好作品在读者心灵上所唤起的那种常有的共鸣，我想到的，还要更多、更多！

三十二年前，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改天换地，推翻了一个罪恶的旧世界。为保卫人民的胜利，捍卫革命成果，在无产专政的新中国，监狱、法庭、劳改，理所当然的会是我们整个国家机器中，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。它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，象其他许多重要的战线一样，公安，是重要的战线之一。然而，许多年来，我们的文学作品，是不大触及这个领域

的，就是写，也多属于反映隐蔽战线的反特斗争，反映监狱和劳改生活的作品，实在是凤毛麟角。

写得少，原因自然是很复杂的，我没有能力对这种情况，作出分析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即写这方面的作品，必须足够地占有这方面的生活。仅凭听听介绍，看点材料，作些采访，怎样的高手，也难以写得成功。

维熙的作品，填补了这个空白。《大墙》一下子便把我抓住了，这也是原因之一。

但我喜欢《大墙》，还决不是因为“缺者为贵”。我赞美这，头一个冲过火网的战士；赞美这，头一个越过障碍的选手；但更为赞美的，还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深入发掘，对各种人物的深刻体察。

在作者笔下，正面的、反面的，一个个人物，有血有肉，见棱见角的，跃然纸上。不是靠了叙述，不是靠了描写，而是把每个人，置身于行动之中，事件以内，让他自己走出来，大大方方地和读者见面。由于作者对这些人物的熟悉，使你对每一个人物的感觉，都不是一片单薄的剪纸。你可以掂到他的分量，感到他的厚度，他们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的，立体的活人。

不管是作者所歌赞的、真正的公安战士，不屈不挠的葛翎也好，不管是作者所鞭笞的、糟踏公安人员称号的丑类章龙喜也好，不论是恶贯满盈的马玉麟，还是蒙受冤枉的高欣，活现在眼前的每一个人物，都使你觉得真实可信。如果有谁硬要因袭什么陈旧的观点，重复那种令人生厌的提问，说什么：“难道是这样的吗？”我作为一个读者，也作为一个稍稍接触过一点这方面生活的作者，敢于回答：是这样的。这样的人物，我见过许多！

我喜欢维熙的作品，也喜欢维熙的作人。属于他艺术上的成就，这篇短文，难于更多的谈及。但有一点必须谈到的，是维熙作为一个无产阶级作家的品格，他对祖国、对人民深厚的感情，

对党的事业，百折不渝的忠贞。

不可讳言，过去由于“左”的错误，曾几度的搞乱了他的阵线，使不少好同志，长期蒙受了不白之冤，维熙便是其中的一个。一个不满五十岁的人，差不多有小一半的时间，是作为被“专政”的对象，生活在这块国土上。吃窝头、睡草铺、扛木头、下煤窑……而且不仅仅是他本人，妻子、岳父，一家人也经受着相似的命运。

但维熙既没有被狂风吹倒，也没有被浊浪淹没。他象许多坚强的革命者一样，没有把这些，视为是个人的恩怨，而是当作了对自己的一次考验。不正象他在作品中所描写的一样吗？历史的“误会法”，尽管把龙蛇都关在了同一个笼子里，但那里仍是敌友相峙、泾渭分明的，并没有因为同抬着一副土筐，而抹杀了他们的界限。那里，和我们其他的生活领域一样，仍然是个战地，而且是战地的前沿。

当然，道路是极其严酷的，久久不散的云雾，使眼前的“能见度”很低，前途在哪里呢？意志薄弱的人，也许，每分钟都可以下沉，但维熙没有倒下。即便在那样的逆境之中，他仍是把那颗赤子之心，紧贴着母亲的胸脯，和祖国，和人民，跳着同一的脉搏，睁大着同样的眼睛。他看到恶，更看到善；他看到阴暗，同时更看到光明，看到希望！

也正因为，在作者纯贞的心地中，从没有丧失过这种坚定的信念，他才能那样热爱生活，忠于生活，敢于塑造我们生活中的英雄，也敢于揭示生活中的阴影。没有必胜的信念，是不敢把丑恶的东西，拿来示众的。

在《大墙》之后，几年来，维熙又写了不少的好作品。引起读者重视的，就有《泥泞》、《遗落在沙滩的脚印》、《伞》、《没有嫁娘的婚礼》、《远去的白帆》等多篇新作。现在，群众出版社，把维熙的此类作品，编为一集，以飨读者，无疑是件好事

情。我想，它不仅是一本提供给人们艺术享受的小说佳作，而且是写这类题材作品的一辆“开道车”，会展开我们的视野，给我们以新的启迪。

“四人帮”的那座“大墙”，已经倒塌了，为从我们的生活中，永远消除那座“大墙”的影子，为促进我们美好生活的建设，为扫清我们通往明天的道路，我希望维熙，用那支忠诚的、犀利的、多情的笔，写出更多、更好的新作。

作为一个读者，我在等待着。

一九八二年六月北京

· 目 录 ·

序.....张志民

献给医生的玫瑰花.....(1)

第七个是哑巴.....(22)

伞.....(42)

燃烧的记忆.....(82)

大墙下的红玉兰.....(122)

第十个弹孔.....(187)

泥泞.....(243)

遗落在海滩的脚印.....(361)

没有嫁娘的婚礼.....(475)

远去的白帆.....(538)

从维熙和他的小说.....杜 高(627)

献给医生的玫瑰花

星期天，我到朋友家去做客。碰得不巧，偏偏赶上我那位朋友没有在家。我拔腿想出来的时候，他的小女儿——一个医学院快要毕业的大学生，拉住我的手说：“伯伯！别走了，参加我们的大辩论吧！”说着，把我按坐在椅子上。

这是一场有趣的辩论。几个即将获得医生这顶黄金桂冠的女孩子，正在叽叽喳喳地争吵：医生究竟有没有天职？医生的天职究竟是什么？

一个细眉细眼、扎着两根短辫的姑娘说：“这还用说吗？！军人的天职是打仗；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！”

“‘听诊器’万岁！”身材修长，长着一张圆圆脸蛋的姑娘，象跳着“华尔兹”舞那样，旋转着身子自我陶醉地说，“医生的天职是什么？两个字：行医——”

“行医？这太抽象了！”第三个少女说。

“对了！‘听诊器’、‘手术刀’过得硬，就算是个好医生！”

“那革命的情操，对真理的追求，应当放在什么位置上？”

“……”

不知不觉，我被她们的辩论所吸引。继而，我想起一个老医

生，于是，我以父辈人的身份，用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，参加了对“医生天职究竟是什么”的辩论……

—

事情发生在一九七六年初夏“批邓”高潮时期，当时我这个早已摘帽的“右派”，还算是一个专政对象。

我在劳改队的职务，是个专职的夜班放水员。每到别人酣睡的时刻，我夹起我的武器——一把铁铤，给九百亩正在灌浆的稻田灌水。那天夜里，露水很浓，打湿了我的衣裤，淋湿了我的头发。当黎明的曙色尚未到来，群星却开始向四方无声陨落时刻，我感到透骨奇寒，便匆匆跑向宿舍，想取件棉袄披上——要知道黎明前的冰冷，是最难耐的呵！

刚进铁丝蒺藜编成的大门，我吃惊地收住了脚步。还不到起床的时刻，劳改队已经列队集合。我向大门值班室打听了一下，原来夜里发生了一起打架斗殴；而打架斗殴的不是别人，竟是我同一宿舍的另外两个伙伴：肖枫和柳笛。两个人伤势都很严重，已送场部医院。消息来得如此之出人意外，我扶着铁铤愣住了。

肖枫过去是一个青年画家，柳笛是个歌剧团演员。不知是鬼神差，还是崔队长有意安排，把我们三个过去搞文艺的摘帽“右派”放在一起，我还奉命，当这个三人小组的组长。肖枫、柳笛在文艺这个行当里，属于一专多能的全面手，几天之前，就叫他俩扔下铁铤，准备明晚去登台表演节目；我则属于蠢才，是个纯粹的劳动力，每天夜里在星罗棋布的稻田小垅上，赤着脚板奔跑。怎么能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哩！

据说导致这个结局的起因十分简单。肖枫奉命给舞台后幕画一张“批邓”漫画；柳笛的任务，是在“批邓”文艺晚会上，清

唱《红灯记》中“谢谢妈”一段折子戏。在肖枫挥笔作画时，柳笛的练唱对“画家”发生了干扰，于是由文斗而武斗，由争吵而诉诸拳头。肖枫长得高大墩实，近二十年的劳动改造，练就一身钢筋铁骨，一只胳膊就能夹起一根房梁。他在人类心理学分类中，属于“多血质”的类型。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时，正是炎阳盛夏，他看见一个老红军出身的“右派”接受批斗时，汗如雨下，就动了恻隐之心，给这个老同志捧来一杯子凉开水。仅此一条他被定为“中右”。最后，这个单位凑不够百分之十的数字，他从“中右”升级为“右派”。这一下，肖枫动了肝火，撕了他的划右结论，当天就被送到劳改队来。歌剧团演员柳笛，性格和肖枫相反，他是广东人，身材瘦小枯干，前额微微外凸，眼眶深而里凹，几乎是劳改队中最矮小的人儿——往那儿一站，好象秋收时忘记了割掉的一株秫秸杆。但就是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五短人儿，上帝给了他一副宽厚雄浑的声带，叫他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歌剧演员。他沉默寡言，每天浸沉在1234567这几个阿拉伯数字组成的无穷旋律之中，如痴如呆。他最爱唱的歌是《伏尔加船夫曲》，只有在他面对旷野，放开喉咙的时刻，才会感到这个凋敝得象秫秸杆似的人儿，心在跳，血在涌，艺术家的狂热，象地火岩浆，蕴育于冷峻沉默的地壳之中……

这样两个知识分子，发生格斗是不可理解的，特别叫我吃惊的是，这不是普通格斗，是近乎于原始社会野蛮人的厮杀。肖枫凭着体力，按倒了柳笛，把半瓶滚烫的开水，倒进柳笛张开的嘴里，烫坏了他的喉咙、声带；小个子柳笛嘴肿得象歪嘴桃子。当肖枫以胜利者姿态喘气时，柳笛突然一跃而起，用握在手里的指甲刀，猛然向肖枫的眼睛扎去。——他们彼此想扼杀对方的艺术生命！

我的心不寒而栗。这不是由于我披着一件湿淋淋的褂子而感到的寒冷，而是在这一瞬间，我突然想起了杰克·伦敦笔下的小

说，在这儿找到了似曾相识的情节和人物。这，难道应当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生活真实？！

“叶涛！”在队列前讲话的小崔队长，发现了我，向我喊道：“你在值班室转悠什么，站到队列里来！”

“水还没有放完，”我解释着说，“回来取件衣裳！”

“不要放了，你另有任务！”他板着面孔下着命令。

小崔队长是个部队转业的班长，人长得十分精干，中等身材，一张娃娃脸。对我们训话时，虽然有时故意板起面孔，装得十分严肃，以表示界限分明；但说话时常常不小心，把“同志”这个不应当用的字眼，从嘴角舌尖蹦了出来。然后自我解嘲地一笑，在笑波里，展示他灵魂的纯洁和善良。今天，肖枫和柳笛的斗殴事件，象一阵风，吹跑了他脸上的腼腆。我浑身感到透心凉的时候，他脸上却在冒着汗珠。显然，他感到恼火，又感到紧张；这不仅仅因为打架斗殴发生在他管教的劳改队，更重要的是肖枫、柳笛不能参加“批邓”演出，他这个芝麻粒大的劳改队队长，承受不了来自乔政委磨盘大的压力。

小崔队长用发黄的军帽，抹了抹头上汗珠说：“你们这么多‘右派’，难道没有一个人会唱样板戏？”

沉默。

他有点着急了，伸出一个手指头：“会唱一段就行！比如：‘谢谢妈’那一场！”

几十个人的队列，没有一个人应声。黎明中早醒的家雀飞上檐头树梢，叽叽喳喳地叫成一团。

小崔队长心烦地一挥手，家雀忽地一声飞了。他那双目光转向我：“哎！叶涛！过去你是搞文艺工作的，今天晚上你替柳笛上台！”我刚想辩解什么，他以强大“火力”先发制人了：“你们都应该知道，这是乔政委亲自布置的，这对于你们所有‘摘帽右派’是个考验，考验你们世界观的改造程度！”

我是个五音不全的音盲，根本完不成小崔队长交给我的任务，但在队列几十双眼睛之前，我不愿叫他无法下台，所以，既不应承，也没有反对。

小崔队长大概认为已经找到了“替身”，一挥手说：“散会出工——”

劳改队的院子空了下来，我心情沉重地走回屋子。这间屋子只有肖枫、柳笛和我三张木床，如今他俩的衣物尚在，可是人不见了。肖枫床上摊着一张洁白的图画纸，“批邓”漫画没有勾画出一笔；柳笛的铺位上放着一把二胡，和翻开的“样板戏”戏本。

“风去楼空”，一种寂寞和忧伤之感，潮水般地涌上我的心头。我愣愣地站在门口，头脑中出现两个知识分子格斗的遐想画面，内心真是苦辣交织……

这时，屋门响了一下，长着娃娃脸的小崔队长进来了。他来这里的意思很清楚：“晚会”这块石头压在他的心上，他很怕落实不了，来督促我一下。

我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小崔队长！我无法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第一，我五音不全；第二，到现在为止，我还没有看过一场‘样板戏’！”

他脸“扑”地红了一片，小声地和我商量说：“我看，你少休息一会儿，对付两句，……不然，‘右派’队——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没人上台，乔政委会……”他感到话已出格，本能地闭住了嘴巴。

我很体谅他的为难之处，但确实找不出为他解危的一点办法，再次向他表示，无法上台当“批邓”的演员。他晕红的脸变得苍白了，接着鼻尖冒出细碎的汗珠，他用四川家乡话，小声地骂道：“搞啥子‘批邓’？谁愿意拿良心当狗肺去卖……可是叶

涛，我是劳改队队长，和你们身份不一样……”他长叹一口气，烦躁地坐在床沿上，搓着双手，似乎想从绝径上寻觅到一条出路。

我们默默无言，对坐了好长的时间。他愁锁的双眉，微微舒展了一点，用商量的口吻和我说：“叶涛！你少睡一会儿，到医院去一下，看看肖枫和柳笛的伤势，问问主治医生杨羽，如果伤势不重，能不能叫他们——”

“上台？”我惊异地说。

“不！”小崔队长思忖着。“肖枫眼睛哪怕睁开一条缝，叫他乱勾几笔，把漫画涂抹出来；至于柳笛的节目，我去找找旁人——”

正说到这里，劳改队的一个内勤干事，风风火火地闯进屋里来：“乔政委来电话，询问肖枫、柳笛打架斗殴的情况！”小崔队长闻声色变，他心慌意乱地望了我一眼，匆匆地走出屋子，走了几步，回头又朝我叮嘱说：“叶涛！带上画纸画笔，马上去……”他的脸白中透青，有点象挨过霜打的树叶了。

二

从我们“队”到农场医院，大概有四五里地的路程。

虽然这儿是个劳改农场，但是比得过任何一个天然公园。路旁遮荫的钻天杨，田野上一望无垠的葡萄架……初夏时节，各色野花都开了：红的、紫的、粉的、黄的，象绣在一块绿色大地毯上的绚丽斑点；成群的蜜蜂在花丛中忙碌着，吸着花蕊，辛苦地飞来又飞去……

经常走进这郁郁葱葱的大自然，常常激起我泉涌般的文思——今天，我心里却毫无一点春意。肖枫、柳笛两副面孔，不断在我眼前更替出现：怎么能想象两个知识分子，会发生这样的野

蛮行为呢？特别令人费解的是，他俩一直是很要好的朋友：早在六十年代初——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我亲眼见到这两个艺术家，如何共患难同呼吸。

当时我们的劳改地点，是靠近渤海湾的一个农场，我看见小个子柳笛常常勒紧自己的腰带，把省下的窝头，留给大个子肖枫吃。肖枫是捉鱼摸蟹的能手，当他带着浑身泥巴从苇塘河沟旁边回来，总是把圆脐的肥螃蟹（母蟹）让给柳笛吃。艰苦的生活考验，使他们成为异姓手足；有人开玩笑地比喻他俩，是七十年代的梁、祝，那股亲热劲象是在搞同性恋爱。这当然是因为长期生活在没有女性世界的一种遐想……但，这也是对他俩友谊最形象的一幅画面。

我忐忑不安地走进场部医院，护士告诉我主治医生在病房。我焦急地穿过米黄色的长长楼道，推开二号病房的房门，一个身材削瘦，两鬓斑白的老医生，从病榻前回过头来，严厉地打量着我，那种目光就象暴风雨前突然亮起的闪电，使我心里一惊，不由地收住了脚步。我本能地望望自己，原来我还穿着那身湿淋淋的工服，光脚板上还带着稻田的泥巴——医生大概不愿意，让我脚上的污泥，弄脏了这光洁的病房。

对着他“闪电”般的眼光，我有点嗫嚅地说：“我找杨医生！”说话之间，两只眼睛不自禁地朝那两张病床望去，我是多么想看看他俩的面孔呵！哪怕是短短的几秒钟！但是老医生用床单蒙上了两个患者的脸，冷若冰霜地对我说：“为什么不敲门就进病房！”

“我……急于想看看……”我指了指病床，用手势表明我没有说完的意思。

“这儿是医院！不是会客室！”

“老医生！是我们队长叫我来问您一下——”

他粗暴而严厉地打断我的话，一指门口：“出去！现在你就出去！马上离开病房。”

多余的话，是不用说了，我不情愿地走出病房，心中不觉对这个医生产生了反感。我不记得在哪一本外国的长篇小说看到过了：“粗暴的医生，十个当中有九个是草包饭囊。”我快快不乐地坐在楼道里的长椅上。我刚刚坐定，老医生推门而出，朝我打了个“跟着他走”的手势，便径自朝前走去。

他步子迈得大而均匀，皮鞋发出有节奏的“嘎嘎”声响。我尾随在他身后，走出楼道，穿过一片桃树林，在桃林尽头三间红砖房前停下脚步。他掏出一串钥匙，选了其中的一个，捅开门锁，用目光示意叫我进去。

我有意无意地抬头一看，马上愣住了；门口木牌上写着三个大字：“太平间”。我心里不禁盘算开来：“带我到这儿干什么？也许有个死者，医生要抓我这个专政对象当劳动力，帮他干一点什么吃力的活儿！”我迟疑地站在门口，没有能立刻服从他的命令。他这次没有发怒，朝我微微笑了一下，自己先走进太平间去了。我无奈地跟着他进去，他“砰”地一声关闭了“太平间”的房门。

我好奇地望着这几间房屋，虽说这儿是“太平间”，但四壁洁白，每扇大玻璃窗都敞开着，没有凋谢完的桃花，依附在枝杈之上，在窗外探头探脑，给这几间停放死者的房子，打扮得有点“诗”意。室内并排放着几张死榻，但死榻上空无一人。我对老医生叫我来这儿的目地，似乎更难理解了。

他身子靠着窗台，用审视的目光望着我。

“奇怪吗？”他问。

我点点头。

“因为这儿最太平……”他含而不露地好象提示我什么。

我迷茫不解地望着他的面孔，想从他脸上寻找到我不能理解的东西。但是，我失望了，他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蛛丝马迹，能提供我思考和判断。我凭着直觉只感到一点：刚才对我的狂怒已经